**南 开 大 学**

本 科 生 学 年 论 文

中文题目：当代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困境及其根源

——评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及其建构路径

外文题目：The Origin and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Liberal Democracy -- On C.B. Macpherson’s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Theory and its Construction

学 院： 哲学院

完成日期： 2020年4月30日

摘 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晚期资本主义面临的一系列严重危机，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及代议制民主陷入“困局”。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者，C.B.麦克弗森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对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源进行探索，提出了“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是导致西方自由民主危机的祸首，并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当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给予了批判。对麦克弗森的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及其建构路径展开深入研究，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麦克弗森将理论根源追溯到17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通过对从霍布斯、洛克到19世纪功利主义者的自由主义理论的梳理，提炼出隐含于其中的统一预设“占有性个人主义”概念，以及分析与之对应的“占有性市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他揭示出自由主义民主社会的内在困境。在系统性地提出了“占有性个人主义”理论后，一方面，麦克弗森提出了两种“民主最大化”主张，肯定其中发展性的人性观，并且通过分析自由主义民主与民主真正价值的不相容来批判自由民主制度。基于自由主义民主缺陷，他从密尔的民主模式中找到了“发展性个人主义”观念以补救“占有性个人主义”。另一方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进行批判，指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能力净转移”关系，使人无法拥有平等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权利。

应当说，“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既是麦克弗森用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困境的根源，也是他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世界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的重要表征。麦克弗森抓住了“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也就把握住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内核”，在这种意义上，麦克弗森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麦克弗森并未局限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内部去寻求自由民主危机的解决之道，而是援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然而，麦克弗森的问题在于，他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民主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何以批判自由民主，以及西方自由民主困境的根源，从而陷入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摇摆状态。本文正是从这一点来分析麦克弗森政治理论建构的价值和局限的。

关键词：占有性个人主义；占有性市场社会；自由主义民主；马克思主义；平等

**Abstract**

In the 1960s and 1970s, with a series of severe crises faced by late Western capitalism, the dominant ideology of Western capitalism, liberalism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falls into a dilemma. As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philosopher and the neo-Marxi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B. Macpherson explores the root causes of this dilemma based on the social realities of Western capitalism. In addition, he proposes that the thesis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leads to the crisis of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 and he also criticizes contemporary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 with Marxist theory. It still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essenc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when we do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MacPherson's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concept and its construction path.

MacPherson traces the theoretical roots to the classical liberalism theory in the 17th century. By combing the liberalism theories from Hobbes and Locke to the utilitarians in the 19th century, MacPherson refines the unified presumption implicit in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ism and analys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ccupied market society. He reveals the inner dilemma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society from this theory. After systematically proposing the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n the one hand, MacPherson points out two sorts of democracy maximization propositions, in which he affirms the developmental view of human nature. Moreover, he criticizes liberal democracy by analyzing the Incompatibility of real value of democracy and liberal democracy. Finally, he creates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al individualism from Mill's democratic model to remedy the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n the other hand, he criticizes the capitalist market society with the ideas of Marxism, and mentions that the unequal transfer relationship of rights between people cannot achieve their self-development equally.

Generally, the concept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is not only the root of MacPherson's grasp of the predicament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liberal democracy, but also an important symbol of his dual criticism on western liberal democratic world and capitalism. In a sense, MacPherson 's work is worthwhile. Because he grasps of the concept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catches the core of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 Meanwhile, MacPherson is not limited by seeking the solution of the crisis, which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within the western liberalism democracy, but cites Marxist view of class. However, MacPherson 's problem is that he failed to understand why Marx criticizes liberal democracy, and failed to reveal the root of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 dilemma. Therefore, he falls into a swing between Marxism and liberalism. From this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alue and limitation of Macpherson's political theory construction.

**Keywords:**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Possessive Market Society; Liberal Democracy; Marxism; Equality

目 录

[摘 要 2](#_Toc39137827)

[**Abstract** 3](#_Toc39137828)

[一、问题的由来 5](#_Toc39137829)

[二、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根源：“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 6](#_Toc39137830)

[（一）“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与“占有性市场社会”的形成 7](#_Toc39137831)

[（二）“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发展与内在困境的显露 10](#_Toc39137832)

[**三、**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 13](#_Toc39137833)

[（一）批判自由民主制：认识“民主最大化” 13](#_Toc39137834)

[（二）以“发展性个人主义”补救“占有性个人主义” 14](#_Toc39137835)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社会 16](#_Toc39137836)

[四、介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 18](#_Toc39137837)

[（一）“占有性个人主义”理论建构的贡献 20](#_Toc39137838)

[（二）“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局限 22](#_Toc39137839)

[参考文献 25](#_Toc39137840)

一、问题的由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西方晚期资本主义面临的经济、政治、社会等一系列严重的、全面的危机，新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1]](#footnote-1)，自由主义及代议制民主也陷入了“困局”。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西方社会巨大的贫富分化、自由市场经济似乎成为民主的“敌人”、个人主义的理念瓦解着公民的公共责任、代议制政府则注重追求自身的利益，致使公共善和公共利益失落，在这种情况下，以代议制为核心的西方自由民主陷入了“合法性”危机。

作为20世纪最重要西方政治哲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者，C.B.麦克弗森（C.B. Macpherson，1911-1987）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对西方民主困境的根源进行了深刻思考，提出“占有性个人主义”[[2]](#footnote-2)观念是导致西方现代民主危机的“祸首”。麦克弗森一方面从西方自由主义哲学的发展线索中，提炼出“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及其补救观念“发展性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这种“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展开批判，并因此对当代资本主义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构成了“双重批判”。无论是从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视角看，还是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视角看，麦克弗森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哲学家。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如阿尔都塞和阿伦特相比，麦克弗森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深刻揭示了“占有性个人主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伦理基础”，何以从“有力支撑”走向了“失效”的过程；他进一步从社会历史根源处剖析了西方自由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基于此，从规范性基础上寻求解救西方民主困境的良方。正是因为麦克弗森以其批判资本主义但又保留并捍卫自由主义价值的思想特征，运用缜密的论证逻辑，依靠理论文本本身“内在批判”式的分析范式，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议。学者彼得·林赛（Peter Lindsay）认为，在当下研究麦克弗森的理论仍极具价值，“因为他提供了批评在当代世界中取得暂时胜利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标准，自由主义民主的胜利的原因在于：它的自由市场而不是它的道德的优越性，它的胜利使得后面一个问题被掩改。”[[3]](#footnote-3)国内学者也普遍认为， 201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再版麦克弗森的著作《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即是说，在全球经济依然被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背景下,麦克弗森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治的反思，在今天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启示[[4]](#footnote-4)。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麦克弗森思想的总体评介和研究是较为丰富的，但是在专题性研究或问题式研究方面还有待深入。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将麦克弗森对“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推导为线索，具体考察他对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困境的剖析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考察过程中，揭示其理论构建路径的价值和局限。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的阐述是基于对霍布斯和洛克等的理论进行细致的、历史性的梳理基础之上的,而不仅仅是抽象地分析和论述“占有性个人主义”概念本身，这也使他能够立足于思想史而思考问题。总之，我们将在较为系统呈现麦克弗森对当代西方自由民主困境根源、机制、批判以及补救方案的思考过程中，具体揭示麦克弗森政治理论的价值和缺陷。

二、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根源：“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

面对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民主遭受的困境，麦克弗森将其理论根源追溯到了17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中，他通过对西方17到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史的梳理，抓住了关键性“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观念，并定义了“占有性个人”与“占有性市场社会”。正是这一预设把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联结起来，使得他进一步论证找出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所遭遇的困境正是根植于个人主义的占有性。

正如有学者指出：“要考察自由民主的未来，最好从头开始……有必要搞清楚‘自由民主’一词的含义，在谈论之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5]](#footnote-5)麦克弗森就是从考虑民主的问题和未来的角度去考察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之源的，他认为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起源于第一位现代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人性观，到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财产权利作为基础而得到巩固，直至功利主义发展到极致。在本章中，笔者将通过呈现麦克弗森对西方自由主义哲学传统的梳理，把握其“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的建构路径，并分析为何这一隐含预设是西方自由民主困境的根源。

（一）“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与“占有性市场社会”的形成

对于政治社会或政府的起源问题的思考，是近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一般认为，霍布斯是第一位将道德和政治生活认识建立在明确的原则和严密的推理科学基础之上的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认同这种一般见解，将自己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理论的源头追溯到霍布斯本人。

首先，麦克弗森从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的人性假定中推论出“占有性个人主义者”的人性观。众所周知，“自然状态”是霍布斯政治理论的“起点”，通常被理解为非文明人的状态。对此，麦克弗森指出：“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或‘人类的自然状况’不是针对与文明人相对的‘自然’人，而是针对有明确文明欲望的人”。[[6]](#footnote-6)所谓自然状态，是霍布斯观察同时代社会中的人推理出的假定，是主权国家产生前文明人社会生活表层下的“自然”倾向。在麦克弗森看来，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中的人性的假设，也并非是自然的、普遍的，它所来源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状态。因此麦克弗森解读：“霍布斯的全部政治学说来自他对人性的分析,其实只是对资产阶级的人的分析”[[7]](#footnote-7)。基于此，麦克弗森将霍布斯前提性的人性归结为占有性个人主义者的人性，并对这种关于人类本质与人类社会的“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做出定义[[8]](#footnote-8)。

其次，麦克弗森从霍布斯式的“占有性个人”所蕴含的权力观，推导出“占有性市场社会”的社会观。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意义上的“贪婪的、反社会的”人，具有一种免受他人意志支配的“自由”和对自己能力的“所有权”，这样的个人之所以进入社会关系，纯粹是为了自私的目的，也就是说，这种个人只不过把社会关系作为增进其自身“权力”的一种方式。根据麦克弗森的理解，在霍布斯自然状态下的“人”由于天生追求更多的“权力”，从而导致了“每个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倾向。这就意味着，在霍布斯那里，假定所有人都具有一种寻求超越他人能力的权力观。所以，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占有他所欲求的事物的能力与所有其他人的能力相冲突，权力的相互竞争就成为“个人的驱动力”。

在麦克弗森看来，这种权力观也隐含着一个预设，即存在一个“权力的市场”。在这里，人的“权力”变成了“商品”，人的价值与尊重通过自身价格衡量，而自然状态下的“战争状态”是市场交换的隐喻。换言之，所有人在市场中作为商品拥有者而相互竞争，利用开发自身能力得到的市场价值，获取财富并支配他人，竞争性市场的本质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麦克弗森的看法是，霍布斯“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除了无序竞争市场中人与人之间的“同等不安全状态”之外，还包含着“每个人都从属于市场关系”这种意义上的平等。

由此，麦克弗森就从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人性观加之权力市场的存在，自然合理地推导出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即占有性市场社会。虽然麦克弗森提出了三种待选的样本[[9]](#footnote-9)，但他最终认为只有“占有性市场社会”符合霍布斯的理论建构。在“占有性市场社会”中，劳动力与土地及其他商品一样都可以自由转让，“一切所有物，包括人的精力在内，都是商品……所有的个人……必须在市场上，在与别人的竞争中，不断地提供（最广义）的商品”[[10]](#footnote-10)。在此基础上阶级分化逐渐发生，劳动能力转移也开始出现。

至此，与其说麦克弗森找到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根源，不如说他依据“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进行了解读和重释，按照麦克弗森的观点，霍布斯从相互分离的个体利益和意志的事实本性出发推导出政治权力和义务，进一步确立了主权学说，揭示了个人主义基础的现实性。正因为如此，麦克弗森在回顾自由民主时说到：“任何政治制度的运转很大程度上以来与所有其他机制（社会和经济）是如何塑造或将要塑造那些通过他们、依靠他们才能够使政治制度得以运行的人”[[11]](#footnote-11)。在这种意义上说，麦克弗森将霍布斯赋予政治思想史上比洛克更高的地位，在他看来，是霍布斯而不是洛克是真正意义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奠基人。当然，麦克弗森并未完全忽视洛克对于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的肯定和贡献，因而将洛克视为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完成”。

再次，麦克弗森通过阐述洛克对于霍布斯学说缺陷的矫正，指明了占有性个人主义何以在洛克的理论中得以“完成”。麦克弗森认识到，霍布斯学说中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团结基础——阶级。麦克弗森认为，洛克矫正了霍布斯的这个错误，使得自身理论更为世人接受，深层次讲，这也使得他们二人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的问题上具有相通性。

当然洛克的论证前提不在于人的本性，而是自然法（上帝的意志），他在自然法的基础上论证了一种基于劳动占有的私有财产权利，以争取人民的自由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但是，麦克弗森强调，洛克把有限的占有权转化成了无限的占有权，他说：“洛克的惊人成就，就是将自然财产权利建立在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的基础之上,之后又从财产权利中移除了一切自然法的限制”[[12]](#footnote-12)，展现了强烈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假定。

事实上，洛克本人的确根据自然法对占有权利规定了几个限制——充足性的限制、浪费的限制和劳动的限制[[13]](#footnote-13)，只有在这些限制条件下，个人的占有才具有正当性。但是在麦克弗森看来，货币的引入，使得洛克逾越了上述限制，也为财产占有无限制的不平等提供了理由。麦克弗森指出：“洛克看到了货币的商品价值以外充当资本的价值”[[14]](#footnote-14)。在货币产生后，人们有了超过需要、无限制积累的占有欲，正是由于资本的本质属性是增值，使得资本被当作投资获利，从而产生更多的资本，循环往复。因此，麦克弗森相信，洛克的财产权利理论后也隐含了一个“占有性的市场社会”。洛克对于雇佣劳动关系的承认，使得占有性市场社会的商品得到合理地扩展：“劳动越被强调为一种财产权，就越应当被理解为可转让的。因为资产阶级意义上的财产权不是一种拿来享受和使用的权利，而是一种拿来出售、交易和转让的权利”[[15]](#footnote-15)。

因此，麦克弗森断定，洛克通过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方法，突破了自然法对于无限欲望及资本累积的限制，为资本主义据有完成了一次道德革命。洛克的财产理论也使“占有性个人主义”获得了坚实的支撑。至此,“占有性个人主义”拥有了逻辑上的完善,麦克弗森将其所包含的预设总结为七个命题[[16]](#footnote-16)。“占有性个人主义”理论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经济行为正当性的辩护，也成为了17 世纪直到 20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根基。

（二）“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发展与内在困境的显露

从麦克弗森的视角来看，除形成“占有性个人主义”理论的17世纪自由主义阶段以外，他研究“占有性个人主义”的过程，还包括依旧接受这种假设、从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19世纪早期自由主义民主阶段。

尽管这一点遭到了国外学者邓恩（Dumn,J）的质疑：“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着的连续性与继承性并不是体现在占有性个人主义这个理论前提上”。[[17]](#footnote-17)但是，麦克弗森还是坚持认为，最早将自由主义加以民主化的是功利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杰里米·边沁，其追求功利最大化的理论看似替代了以占有性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实质上它是由霍布斯、洛克式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发展到极致的结果。

麦克弗森认为，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接受了市场社会，假定了一种有关人的模式（功利最大化、无限制物质财富欲望的追求者）以及社会的模式（持续地以他人为代价谋求权力的个人的集合体），实质上是对“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的重述和发展，因而只是实现了工具化的民主。

对于19世纪至20世纪流行的自由民主理论，麦克弗森根据“什么是民主的本质”的价值判断这一标准，划分了三种相继出现的自由民主模式：“保护型民主”“发展型民主”“均衡型民主”[[18]](#footnote-18)。当然，在这里麦克弗森的目的是从杰米里•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推论出其“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人的模式和社会模式。麦克弗森认为，古典功利主义倡导保护型民主，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是指：“判断社会善唯一理性的可辩护标准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9]](#footnote-19)。这一标准蕴含着对人性的假设，即是说，每个人都按其本性试图不受限制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快乐，而“物质性的快乐可以视为获取其他满足的基础”[[20]](#footnote-20)，因此人的幸福被转化为追求物质财富的幸福。功利最大化的实质就是拥有财富的最大化,人在本质上成为对物质财富无限制的追求者、功利最大化的追求者。进一步，这还意味着“实现财富最大化的一种方式是获取比别人更大的权力”[[21]](#footnote-21)，这显然继承了霍布斯、洛克的思想。按照麦克弗森的理解，在这种个体权力观的假设下，社会成为一个持续地以他人为代价谋求权力的个人的矛盾集合体，因此法律的保障不可或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假设蕴含了平等主义因素，即计算社会的幸福总量时，每个人都算作一个。正是这种蕴含平等主义的个人主义使得边沁的理论达成民主得以可能，但边沁立法的目标使得这种“平等必须让步”。这就是说，法律必须保护竞争式市场社会运作的动力，必须把财产安全原则提升到比平等更高的位置，用麦克弗森的话说，边沁“接受了自由民主的目的是与市场社会联系在一起”[[22]](#footnote-22)。在麦克弗森看来，保护型民主立法的本质就在于保护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个人权利与占有性市场社会的发展，维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市场关系。麦克弗森在评价古典功利主义者时说到，他们把“平等的道德原则和有关人和社会的竞争性市场模式结合，逻辑上得出了支持民主选举权的结论，但与此同时也使他们的结论含糊不清”。沉浸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没有摆脱占有性个人主义人的模型、依然依靠一个占有性市场社会的特点使得他们的理论不断受到占有性个人主义不平等前提的渗透和危害。他们一边选择了代议制政府，一边将选举权引入了民主模式，企图将民主的结构安放进这样一个阶级分裂的社会，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计划,“自由主义民主自边沁和詹姆士·穆勒起，在一个可怜的起点上起步。”[[23]](#footnote-23)

可见，从霍布斯开始一直到19世纪的早期自由主义民主理论都努力为占有性市场社会的合理性提供理论辩护，而“占有性个人主义”作为他们统一的预设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渐扫清了道德上的障碍。正如国外学者皮特•兰姆（Peter Lamb）对以下平衡状态做出的肯定：“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具有无限积累的权利，这种权利被认为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不断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条件，而资源匮乏反过来又是满足无限欲望的最佳手段”[[24]](#footnote-24)。市场的观点和资本主义的自由获得了暂时的胜利。

然而，重要的是，麦克弗森认识到，也正是由于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及其发展，使得西方自由民主在二十世纪“陷入困境”。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工人阶级开始争取平等政治参与的权利，并向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占有性个人主义在道德约束力上开始失效。麦克弗森论证到，当代自由民主国家已然陷入困境，“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前提假设逐渐失效，这是由于两个前提条件的改变造成的。首先，无限制占有与私有财产的主张使得劳动工具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人们不再相信进入市场竞争规则是平等的。其次，当有产阶级承认其他社会阶级的选举权而不得不放弃政治权力垄断时，有产者阶级内部的凝聚力随着平等的公民投票权的建立而瓦解。因此，当代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在于：保持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事实性和现实市场社会结构改变之间的矛盾。麦克弗森深刻地指出，正是由于“占有性个人主义”依然作为当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基础，但却日趋与民主制度相背离，才导致了“二十世纪的困境”。

**三、**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

在论述了当代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困境的根源就在于“占有性个人主义”之后，麦克弗森对自由民主制和占有性市场社会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值得关注的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市场时，他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批判武器，对私有制和生产关系造成的不平等的权力转让关系进行透彻的剖析和剥离。

虽然指明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但是麦克弗森仍然在自由主义民主框架内寻求解决方案，为了使得自由民主继续存在下去，他转向了一种人道主义民主，唤回个人的道德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他肯定了密尔发展式的人性观，恢复注重个体的平等与自我完善，并以“发展性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建立其民主理论。

（一）批判自由民主制：认识“民主最大化”

麦克弗森的认识是，在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中，自由主义根植于占有性个人主义并由其发展而来，民主是后来被置入到自由主义理论之中的[[25]](#footnote-25)，也就是说，“在民主出现在西方世界之前，就有了选择的社会和政治”[[26]](#footnote-26)。然而，正是由于占有性个人主义和民主价值本身的不相容，造成了自由主义民主这种现代综合的不稳定和危机。麦克弗森坚信“使得民主政治制度在社会中得以运行的是人的本性的假设”[[27]](#footnote-27)，因而他要批判阻碍民主价值的自由民主制度，首先就要批判运行其中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人性观”。

 首先，对自由民主规范性的分析成为麦克弗森民主理论的主要线索，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人性、自由、民主等概念的规定上。对此，最系统的说明体现着在他1973年出版的《民主理论》中“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合理性建立在两个最大化的主张之上——即功利最大化和个体能力的最大化”[[28]](#footnote-28)。当然，这两种观点背后也反映了哲学家们对人的本质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理解，即前者把人当作无限的占有者和消费者，自由意味着“强者通过遵守市场规则击败弱者”；后者把人看成是在能力和道德上能够不断提升的发展者，自由是确保“所有人可以平等而有效地使用和发展他们能力”[[29]](#footnote-29)。这两种含义在发展史上始终在尝试彼此融合。

根据麦克弗森的说法，人是自己能力的运用者和发展者这个观点更古老，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时期和基督教思想中，代表一种人的本质是追求自觉理性的活动以实现潜能的传统观念，直到17世纪都支配着西方政治传统。但是，17 世纪现代市场社会的出现、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的产生使得人本质上是无限制的消费者的观念逐渐得势。这里的功利最大化也就是占有性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的古典功利主义人的模式。

麦克弗森认为，尽管根植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人性观，使得物质财富的无限占有在理性和道德上被接受和保护，但是，人的能力同时也被限制在了扩大自身功利以满足享乐欲望的范围。因此，麦克弗森希望去除占有性的人性观，支持发展性的人性观[[30]](#footnote-30)。在麦克弗森看来，自由主义民主本应具有民主的意义，在提高人的能力方面比自由主义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现实中的 “民主（民主选举权）作为一种最好的装束出现，必须适应竞争性、个人主义、市场社会的运作和自由国家运作，当自由国家被民主化的同时，民主也被自由化”[[31]](#footnote-31)，民主已然无法发挥理想的价值，人发展潜能的实现可能也逐渐磨灭。

麦克弗森进一步指明，这正是由于受到了与占有性个人主义人性观相匹配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制约。他论证到：“人的本质只能通过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才能得以充分地实现。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拒绝了大多数人的本质的潜能的充分实现,并把人的能力降低为商品。”[[32]](#footnote-32) 这就是说，只要自由主义民主接受了占有性个人主义与市场社会的设定，就无法实现民主的真正价值，沦为形式上的不平等的民主。这进一步确证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依赖的道德基础——占有性个人主义原则，它是实现自由民主制危机的根源，应当被祛除。

（二）以“发展性个人主义”补救“占有性个人主义”

麦克弗森尽管觉察到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但他提出“自由的诸种价值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并不能够让自由主义的核心伦理价值——个体实现他或她的能力的自由——总是被限制在这样的社会中”[[33]](#footnote-33)。因此，他决定抛弃“占有性个人主义”，以一种“发展性个人主义”的观念取而代之，基于此将民主从对资本主义市场假设的依赖中拯救出来。

国外学者莱斯（William Leiss）认为，“麦克弗森的发展观念来自密尔，可以说他从密尔那里借来了发展式人性观，从马克思那里借来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批判”[[34]](#footnote-34)。我们知道，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试图矫正古典功利主义的缺点，最早试图将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与人道主义的伦理观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种与边沁主张非常不同又包含着对市场社会的接受的道德模式“发展型民主”。密尔和边沁观点的最显著差异在于如何理解民主制度要达到的目的问题，密尔强调“民主的目的不仅在于维持现状，还在于有助于人类的发展”[[35]](#footnote-35)。

麦克弗森非常重视密尔的民主思想，认为密尔的突出贡献就是把道德维度引入民主模式中，克服了功利主义对人本质做出的不义的市场化假设，将“占有性个人主义”转化为 “发展性个人主义”。首先，密尔坚持发展式人性观，他认为“人在本质上并不是消费者或占有者，相反人是一个展示、发展和享受自己能力的人”[[36]](#footnote-36)。这种观念类似于古典民主中对人的看法，可以说，密尔将古典民主中自我完善的人性观的价值重新得到了充分恢复与体现，并加入到自由理论中使其民主化。

密尔基于这种人性观所建立的政治体制，要求民主制度不能仅仅局限于民主投票权这一保护性功能，还要成为人自我提高、实现自由和平等的必要手段。所以他力图改变“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和占有性市场社会，旨在重新构建一种新型的民主社会以保护公民自身发展的权利、抵抗政府对民主的压迫，实现人全面发展。麦克弗森从中寻找“药方”的同时，指出密尔的政治体制存在漏洞，如在选举权上支持“复式投票”，破坏了平等主义。在麦克弗森看来，导致密尔民主体制缺陷的根源在于，密尔虽然看到了社会上财富分配的不正义，拒绝“占有性个人主义的预设”以去掉道德上的不利因素，终究没有抛弃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与财产制度。然而，这种财产权制度必然会加剧占有性市场中不平等的权力转让关系，巩固人的占有性和消费性，使得与民主应具有平等的价值不兼容。正如学者莱斯诺夫指出的：“事实上密尔也建议保留私有财产制度以及提供经济激励的市场调节制度，这表明了他依然囿于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37]](#footnote-37)。

虽然密尔的民主理论中隐含的“发展性个人主义”存在困境，但是，麦克弗森仍然依据其发展的人性观构建了一种自由主义民主代替模式——“参与式民主”。这一模式克服了占有性个人主义及市场社会的缺陷，将直接参与和代议制民主相结合，回归古典民主中理想的参与观念，以使个人自由和发展充分实现。麦克弗森使政治民主向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等领域扩展，力图重构一个更合理、人性的社会。

当然，麦克弗森的努力也遭到了质疑。比如说：国外学者旺德（Bernard Ward）怀疑麦克弗森能否通过抛弃占有性个人主义来改变人性，并给出具体原因：“他（麦克弗森）的不可原谅的做法是用本质这样的语言来重新构造霍布斯与洛克的等人的理论，这种本质的语言是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黑格尔或马克思的，对英国古典传统来说是陌生的”[[38]](#footnote-38)。因此，通过改变占有性个人主义人性观和抛弃占有性市场社会来达成民主目标是否可能，以及自由民主还如何存续的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社会

麦克弗森对于“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的影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斯瓦切克（Victor Svacek）就关注了麦克弗森在怎样程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认定了他在四个基本理论[[39]](#footnote-39)上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保持一致。那么，麦克弗森是如何从物化、阶级、剩余价值等方面援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去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

麦克弗森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构成的分析和批判，显然借助了马克思的物化理论。他指出在占有性市场社会模型中，追求个人利益拥有了合法性的制度外衣，每个人沦为追逐物质财富的奴隶和计算利益的机器，社会交往的普遍化伦理关系被缩减为商品交换关系，因此人的本质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这无非是对马克思如下思想的转述：“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互相联系，表现为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40]](#footnote-40)。而“物的依赖关系”所代表的现代社会形态会破坏人的自由，“在对物的占有性关系中，人的一切目的简化为对物的占有，人日益成为商品的奴隶”[[41]](#footnote-41)。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这些物化现象与矛盾最终将导向阶级冲突和对抗。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由不同阶级构成，凡是有分工的地方就会有阶级关系，这也是社会的基本关系[[42]](#footnote-42)，学者斯维克（Victor Svacek）意识到，在麦克弗森的理论中也充满着阶级分析。在麦克弗森所设定的“占有性市场社会”模型中，资源的稀缺性和私有制使得资本和生产资料被极少数人垄断，绝大多数人只能依靠在市场中出卖自身的能力使用权。拥有大量土地、财产的所有者，具备优越于其他人能力和技术的所有者，可以积累更多的资本，使得扩大自身效用成为可能。因此，麦克弗森指出社会存在“那些拥有土地和财产的人和没有土地和财产的人之间的阶级区分”[[43]](#footnote-43)。麦克弗森还利用这一方法剖析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阶级产生分化后，麦克弗森注意到了在不平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下，资本所有者拥有的是榨取性权力。榨取与剥削相对应，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竞争法则中，这种榨取加剧了阶级冲突，使个人应享有的平等权利落入深渊。在这里，他利用“能力净转移”（net transfer of power）的概念阐述了阶级分化状况之下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转让关系。

麦克弗森的“能力净转移”概念是由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发展而来的。这一概念，最初用来说明市场竞争中的现象：随土地消耗净尽，没有土地和资本的那些人由于不能求诸独立生产，纷纷依赖出卖劳动力。他们不能要求工资在数额上等同于自身具有生产资料时投入劳动所得的产出，因而造成“那些拥有资本和土地的人就能通过雇佣其他人的劳动力，获得其他人的某些权力（或这些权力的产品）向他们的净转移”[[44]](#footnote-44)，即“能力净转移”。这表明，当一个人缺乏自由获取劳动手段的能力时，他本身的能力就要被为获取这种能力所出价格而削减，消减的这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无异于马克思所论证的：“工人这种超过补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以外的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的、利润的源泉”[[45]](#footnote-45)。一旦资本生产开始，这一过程就连续不断进行。

不仅如此，麦克弗森还将“能力净转移”拓展成剩余价值理论在人的发展领域的独特形式。他将人的能力定义为：“一个人使用和发展他的潜能的能力”，并承认在阶级社会中人的发展能力包含了“萃取能力”（extractive power），即运用自身的能力+从他人能力中获得的能力。基于实现人的能力的目标，他论证到，资本主义社会终究“按照它本质那样，强迫一些人不断地把自己部分能力转让给另一些人，结果是减少而无法使自由主义民主所宣称的个人享有平等地使用和发展自己天然禀赋的自由最大化”[[46]](#footnote-46)。因此，只有抛弃占有性市场社会中的生产逻辑和必然导致的资本积累矛盾，才能使自由民主的价值实现成为可能。

最后，麦克弗森呼吁以共有财产制度代替占有性的私有制。在财产共有中，国家规定个人拥有平等地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进而为个人平等地实现自我发展提供前提。这也体现了麦克弗森对马克思思想的肯定和继承。

四、介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

回顾思想史可以发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论战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最为重要的背景。尤其在极权主义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世界普遍将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作为一种“共识”。大卫•莫里斯（David Morrice）指出：“东欧的共产主义崩溃导致了许多人声称马克思主义死亡了，被广泛讨论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文章赞成以‘经济和自由主义的不败胜利’和‘可替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制度都失效’宣告历史的终结”[[47]](#footnote-47)。在这种境况下，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对如下问题做出有效回应，即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组合真的毫无漏洞吗？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就此衰败？麦克弗森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回到马克思”的。

面对20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危机，当时西方国家的确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求维护和发展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倡导个人自由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强调国家的积极作用。但是，在麦克弗森看来，这些举措并未真正撼动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个人主义，由此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仍然存在着缺陷，麦克弗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一缺陷的根源进行批判，被誉为20世纪“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少数思想家之一”[[48]](#footnote-48)。

学者们对麦克弗森的理论工作给予了不同意义上的评估。西方学者莱斯诺夫评论麦克弗森的思想：“麦克弗森从未兜售过暴力革命的思想，就此而言他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他是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另一方面，麦克弗森用来分析西方历史的解释性架构，以及形成这一架构的伦理学观点，基本上都来自马克思”[[49]](#footnote-49)。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却认为，“麦克弗森的方法理论不属于马克思……他没有保持一致地在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剖析上批判资本主义”[[50]](#footnote-50)。从以上分析来看，对麦克弗森理论工作的评估不能笼统地进行，而需要从不同的意义上展开。

不可否认，麦克弗森并没有系统地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的系统。例如：麦克弗森虽然开创了对“占有性市场社会”的批判路径，却没有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他运用了类似于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阶级分析和批判,却回避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工具去分析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他在为平等和民主努力辩护的道路上却排斥革命，他选择调和两种社会制度，这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背道而驰。诚如有学者指出：“几乎所有关心麦克弗森的重要评论家都要么给他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具，要么给他摘下这个面具”[[51]](#footnote-51)。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麦克弗森划分为某一阵营，毋宁说，麦克弗森的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缩影，通过对其理论的具体评析可以透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根本差异。

综合前文的梳理和讨论，我们有理由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理论建构的意义和局限。

（一）“占有性个人主义”理论建构的贡献

麦克弗森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理论为西方政治学界带来创新思路和贡献，可以说他是20世纪以来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占有性市场批评的最为深刻的理论家之一。西方学者莱斯评论到：“借助这个概念麦克弗森创造了单一维度勾穿其所有至今他所需要的基本概念：市场、平等、自由、民主。占有性个人主义模型的采用使得以下成为可能——探讨人的行为与意志；重解政治思想史，特别是勾勒出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演变过程”[[52]](#footnote-52)。

从自由主义民主的角度看，麦克弗森的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从理论上最终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个人原子化的倾向。个人价值高于社会，社会和国家只是保护个人利益的目的，这种对自身及能力全部所有的占有性人性观，塑造了社会工具化、自我欲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由于这种占有性的人性观念，使得个体不用对社会承担义务，只为自身利益达成契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社会关系都被简单化为一系列市场关系，最终导致德性无所依傍。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弗森在反思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基础上，对道德维度的恢复以及自我完善人性观的恢复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

概括地说，麦克弗森抓住“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也就把握住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内核，联结了自由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根据这个概念对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梳理，找出了当代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困境的根源，从而提供了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世界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麦克弗森不止停留在批判，进而考察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未来如何“自我存续”。

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看，麦克弗森并未局限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内部去寻求自由民主危机的解决之道，而是援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他对于占有性个人主义下的竞争市场社会进行的剖析和批判，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内在逻辑和批判性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财富集中、分配不均的源头在于“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占据支配地位，致使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转让和剥削关系与民主应具有的平等价值不能共存。继而公民的政治参与随着社会加剧的不平等减淡，自由民主国家最终与平等、自由地自我发展的理想背离。因此，他极力挽救自由主义民主，力图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改变占有性市场社会的生产关系，同时以“发展性的人性观”弥补民主价值的缺失。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麦克弗森从马克思主义中萃取出民主的价值，即自我发展的平等权利，推动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发展，对后续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麦克弗森看来，19世纪以来的民主始终停留在一种狭义的民主上，即是说，“民主仅仅是一种选择和授权政府以某种方式制定法律或政策的机制”[[53]](#footnote-53)，自由民主制似乎仅仅囿于“占有性个人主义”。民主政治不应成为一种工具，止步于证明政府的合法性。麦克弗森的重要认识是，民主不仅意味公民政治参与的机会平等，还应该包含平等、自由、正义的价值，为公民自我发展和权利平等创造基础。正如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里定义当代民主的意义：“作为民主的政治共同体的平等成员的权利，即公民权，不仅意味着国家有责任确保在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而且意味公民应当有实际能力来利用他们面前的机会。”[[54]](#footnote-54)

这一民主的价值无疑是来源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对人保持独特的认识，认为“人是类与个体、社会与个人的统一，马克思站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高度来审视、思考人的发展”[[55]](#footnote-55)。马克思关注“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56]](#footnote-56)，这种发展不是脱离社会的、原子化个人的发展，而是“一切人”的发展。民主的目标和平等的价值在《共产党宣言》中尤为体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7]](#footnote-57)，“每个人”的发展是前提，“一切人”的发展是最终目标。由此可以说，正是麦克弗森把马克思的自由、平等的思想导入他对自由民主模式的分析，突破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框架，开辟了自由主义民主的新视野。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真正的民主社会不可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必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为公民实现自我管理、个人发展创造条件这一点也为麦克弗森所借鉴。总之，麦克弗森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提供了许多研究问题的新思路，其对当代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剖析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局限

尽管麦克弗森的思想在西方政治哲学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但是他的理论也存在着问题和局限，这是至今为止不断对学者对其提出批评的重要原因。例如：西方政治理论家莱斯指出：麦克弗森“仍旧停留在要么是资本主义，要么是社会主义之中”[[58]](#footnote-58)。显然，这与麦克弗森的研究方法相关，他持有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仍然属于不存在第三条道路的19世纪的思想范围。但是，麦克弗森的最大问题则在于，他未能从马克思主义民主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何以批判自由民主，以及由此探寻西方自由民主困境的根源，从而陷入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摇摆状态。在这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首先，麦克弗森论述的自由民主模式只停留在对自由主义民主层面的改良上，他努力寻找优化自由主义民主的方法，在本质上不想改变现行的自由主义民主代议制。虽然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减少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改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关键就在于打破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去除“占有性个人主义”和“占有性市场社会”。但他似乎也同密尔一样不愿意触碰资本主义现行的经济基础，只寄托于“更大的民主参与”，并试图突破密尔式的恶性循环[[59]](#footnote-59)。这必然是行不通的，因为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根源仍然存在，自由主义民主的根本局限仍然存在。正如莱斯诺夫指出的那样：“麦克弗森对消费之上的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虽然严厉，他的解决方案确实乌托邦式的和没有希望的”[[60]](#footnote-60)。

其次，麦克弗森拒绝革命，试图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取向，使其无法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在他看来，阶级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国家就必然是一种武力机器，统治阶级通过这种机器来维持剥削其他阶级的权力。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被推翻，阶级剥削才能结束，使人类自由地实现其全部潜力。而推翻这种统治的正是被剥削的工人阶级，有政治意识的无产阶级将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取代资本家的独裁。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历史理论时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再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下解放出来……”[[61]](#footnote-61)。因此，工人阶级革命只是第一步：把无产阶级提升到统治阶级地位，赢得民主之战，将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那样。“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62]](#footnote-62)接下来，无产阶级废除了资本主义秩序，社会就不需要再由对立的阶级组成。可见，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民主的全部目的将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从而结束阶级国家的时代，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明确指出，这一过程要通过暴力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实现，历史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肮脏的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63]](#footnote-63)。

麦克弗森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但他没有看到通过革命转化社会形式的迫切性，而是企图通过微调的方式以达到重新关注人的价值的目的。他宣称：“通向充分民主和充分自由的社会的障碍的严重性不应被低估。但是克服它们的可能性也不能被低估:不是通过美好的愿望，不是通过任何统治阶级向新的道德的不可能的转变，也不是必然通过转化的革命行动，而是通过一种结合。”[[64]](#footnote-64)这种结合的想法可以归因于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导师拉斯基（Harold J.Laski，1893-1950）。社会民主主义一致选择改良的路线，一边吸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一边主张议会民主反对阶级专政。正是这种政治选择，使麦克弗森遭到了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个阵营的攻击。

对我们来说，从马克思主义民主的视角看，在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局限的揭示和批判基础上，就可以断定麦克弗森仍然囿于自由主义民主框架，无法贯彻马克思提出的民主和自由的真正价值，从而无法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通过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关系理论，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本质展开过深刻地分析。

首先，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而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消除市民社会的政治属性，使人重获自由和权利。马克思承认政治解放具有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政治解放还不是整个社会的解放。这也意味着，以麦克弗森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具有根本的局限性，因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只实现了政治和法律形式上的平等，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平等。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人的从属关系”、“物的从属关系”和“自由的个性”。作为政治解放的产物的自由民主制，确立了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和个人主义，因此在对人的潜能解放的同时，人由于被市场关系支配的异化而被套上了新的枷锁，金钱关系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而社会的最高目标就在于解放全人类，实现每个人自由的个性。因此，“人类的解放，首先是要摆脱人的从属关系，其次是要摆脱物的依存关系。前者是人的政治解放，后者是人的经济解放。只有这两种解放都实现，人类才能获得解放，实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65]](#footnote-65)这就是说，要想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就必须消灭剥削，将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将自由的价值真正凸显。在马克思的理解中，私有制和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性分离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和西方自由民主制缺陷的最终祸首。据此，麦克弗森的对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矫正不改变资本主义现行的经济基础，终究无法将民主推向更高的阶段，不超越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也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和解放。

参考文献

**1，著作类：**

[1] [加]C.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第1版。

[2] [加]C.B.麦克弗森.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闫飞飞译.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第1版。

[3] [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 许国贤.马克弗森——民主的政治哲学.台北:东大，1993年。

[5] 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6] [美]艾伦·沃尔夫.合法性的限度. 沈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

[7] [英]洛克.政府论.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8]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9] 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局，1998年。

[10] 姚大志.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11] 王新生.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3月第1版。

[12] 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17]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8] C.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9] C.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77.

[20] C.B. Macpherson.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2006.

[21] C.B. Macpherson.The Rise and Fall of Economic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2] C.B. Macpherspn. Democrary in Alberta.Toronto: Unic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3.

[23] Peter Lindsay*.* Creative Individualism: The Democratic Vision of C.B. Macphers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24] William Leiss. C.B. Macpherson Dilemmas of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9.

[25] Jules Townshend, C.B. Macpherson and the problem of liberal democrar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2，论文类：**

[1] 余宜斌.自由主义民主的困境与重建：[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7。

[2] 王钦.利维坦的政治困境——评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中国图书评论.2013(10)：69-80。

[3] 曹帅.占有性的个人与社会——C.B.麦克弗森对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解读:[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12。

[4] 陈尧.拥占性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C·B·麦克弗森的政治学说.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1）：28-33。

[5] 谢雯萍.马克思主义视野中麦克弗森的平等观.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134-140。

[6] 谢雯萍.占有性个人主义批判——麦克弗森政治思想前提性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117-121。

[7] 周枫.近代社会契约论中的个人主义及前提批判.哲学研究，2015（04）：19-24。

[8] 郭国仕.麦克弗森的民主理论:[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8。

[9] 赵玥.本体论视域下的民主思想研究.法制博览，2019（34）：227-229。

[10] 丰存斌.论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性超越.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4）：55-60

[11] 张宇飞. 麦克弗森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8。

[12] C.B. Macpherson. Hobbes Today.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No. 4(Nov,1945), pp.524-538

[12] David Morrice. C.B. Macpherson’s Critique of Liberal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42, Issue 4(Oxford,1994), pp.646-661

[13] Frank Cunningham. Retrieving Macpherson: Critical Appraisal of A New Study. Science&Society, 2003,67(2)

[14] Hwa Yol Jung. Democratic Ontology & Technology: A Critique of C. B. Macpherson. Polity, Vol. 11, No. 2 (Winter, 1978), pp. 247-269

[15] J. Dumn. Democracy Unretrieved or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rofessor Macpherson. British Journe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4, 1974, pp.489-499

[16] Bernard Ward. Macpherson’s Conceptual Apparatu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 No.4, 1971, pp.526-540

[17] Svacek V, The Elusive Marxism of Macpherson C.B. [J/OL].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6, Vol.9, No.3[2009-07-23]

[18] Ellen Meiksins Wood. C.B. Macpherson: Liberalism, and the Task of Socialist Political Theory[J].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8[C].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78

[19] D. Miller. The Macpherson Version. Political Studies, Vol 30. No.1, 1976, pp.377-394

[20] Jules Townshend. Hobbes as Possessive Individualist: interrogating the C.B. Macpherson thesis. Hobbes Studies, vol 12, No.1, 1999, pp.52-71

[21] Patrick Neal. C.B. Macpherson and Liberal-Democratic Theory. The Good Society, Vol.21, No.1, 2012, pp.118-131

[22] I. Berlin. Hobbes, Locke and Professor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35, No.4, 1964, pp.444-468

[23] Peter Lamb. Ideological Reconciliation in the Thought of Harold Laski and C.B. Macpherso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Vol.35, No.4, 2002, pp.795-810

1. 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页。 [↑](#footnote-ref-1)
2. 麦克弗森自称他的占有性个人主义是从R.H.托尼的获取性（Acquisitive）观念中发展而来的；1945年，他在《政治理论研究中的欺骗性任务》中首次使用了“占有性个人主义”这个概念；在1962年出版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中系统地阐述这一概念。 [↑](#footnote-ref-2)
3. Peter Lindsay, Creative Individualism: The Democratic Vision of C.B. Macphers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pp.xii, 176 [↑](#footnote-ref-3)
4. 参见王钦：《利维坦的政治困境——评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10期 [↑](#footnote-ref-4)
5. [美]艾伦·沃尔夫：《合法性的限度》，沈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8页 [↑](#footnote-ref-5)
6. [加] C.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页 [↑](#footnote-ref-6)
7. C.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39 [↑](#footnote-ref-7)
8. 麦克弗森对“占有性个人主义”观念做出如下定义：“个人实质上是自己人身或能力的所有权人，为此他对社会无所亏欠。个人既不能被视为一个道德整体，也不被视为更大的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被视为自己的所有人。所有权关系……被附会到个人的本性中。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是自由的，仅仅因为他是他的人身及禀赋的所有者。” 参见[加] C.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页 [↑](#footnote-ref-8)
9. 第一种“习俗或身份的社会”（customary or status society）中，不存在土地、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社会阶层相对稳固，不会引起“每个人反对一切人”的权力斗争。第二种 “简单市场社会”（simple market society），商品和服务在市场流通，但劳动力本身不可转让，因此没有形成劳动力市场。在这种社会中人满足于自己拥有的权力，不会为保持现状而追求更多权力，因此也不符合霍布斯“自然状态”。唯一满足的只有“占有性市场社会”(possessive market society)，劳动力与土地及其他商品一样都可以自由转让，每个个体在市场中必须以提供商品的形式参与竞争。参见[加] C.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9-62页 [↑](#footnote-ref-9)
10. [加] C.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5页 [↑](#footnote-ref-10)
11. [加] C.B.麦克弗森：《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闫飞飞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页 [↑](#footnote-ref-11)
12. [加] C.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7页 [↑](#footnote-ref-12)
13. 洛克为占有权利规定了三个限制：第一，充足性的限制。一个人在占有某项财产时要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第二，浪费的限制。上帝创造的东西是有限度的，不应被人们糟蹋和败坏。第三，劳动的限制。一个人获得某种财产只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参见洛克: 《政府论》（下），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8-20页 [↑](#footnote-ref-13)
14. [加] C.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4页 [↑](#footnote-ref-14)
15. [加] C.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0页 [↑](#footnote-ref-15)
16. “(1)使人成其为人是免于依赖他人意志的自由。（2）免于依赖他人的自由是指免受任何与其他人的关系约束的自由，但个体为了自身利益而自愿加入的那些关系除外。（3）个体实质上是他自己人身和能力的所有者，为此他对社会无所亏欠。（4）尽管个体不能让渡他对自己人身的整个财产权，但他可以让渡他的劳动能力。（5）人类社会由一系列市场关系构成。（6）因为正是免受他人意志支配的自由使得一个人成为人，所以每个个体的自由只受到保护他人相同自由所必需的那些义务和规则的正当限制。（7）政治社会是一种人类发明物，它旨在保护个体对其人身和物品的财产权，（进而）旨在维系个体（作为自身的所有者）之间的有序交换关系。”出自[加] C.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2-273页 [↑](#footnote-ref-16)
17. J. Dumn, “Democracy Unretrieved or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rofessor Macpherson”, British Journe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4, 1974, pp.489-499 [↑](#footnote-ref-17)
18. “保护型民主”：原则上，民主的政府制度无外乎是保护被统治者免于政府的压迫；“发展型民主”：引进一个新的道德维度，将民主首先看作是个人自我发展的手段。“均衡型民主”抛弃了民主的道德维度，因为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经验证明发展型模式非常不现实，而将民主描述为精英之间在较少有大众参与的基础上达到均衡的一种竞争。参见[加] C.B.麦克弗森：《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闫飞飞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页 [↑](#footnote-ref-18)
19. [加] C.B.麦克弗森：《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闫飞飞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第24页 [↑](#footnote-ref-19)
20. [加] C.B.麦克弗森：《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闫飞飞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第24页 [↑](#footnote-ref-20)
21. [加] C.B.麦克弗森：《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闫飞飞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第25页 [↑](#footnote-ref-21)
22. [加] C.B.麦克弗森：《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闫飞飞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第20页 [↑](#footnote-ref-22)
23. C.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77, P22 [↑](#footnote-ref-23)
24. Peter Lamb, “Ideological Reconciliation in the Thought of Harold Laski and C.B. Macpherso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Vol.35, No.4, 2002, pp.798 [↑](#footnote-ref-24)
25. 正如国内学者许国贤指出：西方的自由主义国家虽然基于竞争性的自由主义立场接纳了民主，但并没有探讨民主是否真正保证了每个人平等的自由权，民主成为竞争激烈的自由社会和国家的附属品 “附属物”。参见许国贤：《马克弗森——民主的政治哲学》，台北：东大，1993年 [↑](#footnote-ref-25)
26. C.B. Macpherson,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2006. P16 [↑](#footnote-ref-26)
27. [加] C.B.麦克弗森：《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闫飞飞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页 [↑](#footnote-ref-27)
28. C.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 [↑](#footnote-ref-28)
29. [加] C.B.麦克弗森：《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闫飞飞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页 [↑](#footnote-ref-29)
30. 发展性的人性观包括“对理性的理解能力 、道德判断和行为能力、艺术创造或沉思的能力 、友谊或爱情的情感活动能力, 有时候也指宗教经验的能力”参见C.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4 [↑](#footnote-ref-30)
31. C.B. Macpherson, 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2006, P14 [↑](#footnote-ref-31)
32. C.B. Macpher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Economic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64 [↑](#footnote-ref-32)
33. [加] C.B.麦克弗森：《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闫飞飞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页 [↑](#footnote-ref-33)
34. William Leiss, C.B. Macpherson Dilemmas of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9 P87 [↑](#footnote-ref-34)
35. [加] C.B.麦克弗森：《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闫飞飞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第45页 [↑](#footnote-ref-35)
36. [加] C.B.麦克弗森：《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闫飞飞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第46页 [↑](#footnote-ref-36)
37. [英]迈克尔·H. 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9页 [↑](#footnote-ref-37)
38. Bernard Ward, “Macpherson’s Conceptual Apparatu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 No.4, 1971, pp.526-540 [↑](#footnote-ref-38)
39. 四个相一致的基本理论假定：一，所有的人本质上是平等的；二，社会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三，知识包含在对物质条件的有意识的理解之中；四，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历史可以不断发展。参见Svacek V, “The Elusive Marxism of C.B. Macpherson” [J/OL].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6, Vol.9, No.3, 1976 [↑](#footnote-ref-39)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footnote-ref-40)
41. 王新生：《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95页 [↑](#footnote-ref-41)
42. 参见Svacek V, “The Elusive Marxism of C.B. Macpherson” [J/OL].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6, Vol.9, No.3, 1976，P401-403 [↑](#footnote-ref-42)
43. [加] C.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7页 [↑](#footnote-ref-43)
44. [加] C.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9页 [↑](#footnote-ref-44)
4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footnote-ref-45)
46. C.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42 [↑](#footnote-ref-46)
47. David Morrice, “C.B. Macpherson’s Critique of Liberal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42, Issue 4(Oxford,1994), P646 [↑](#footnote-ref-47)
48. [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121页 [↑](#footnote-ref-48)
49. [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121页 [↑](#footnote-ref-49)
50. Ellen Meiksins Wood, “C.B. Macpherson: Liberalism, and the Task of Socialist Political Theory”, Th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1978, P216 [↑](#footnote-ref-50)
51. Svacek V, “The Elusive Marxism of C.B. Macpherson” [J/OL].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76, Vol.9, No.3, 1976，P401-403 [↑](#footnote-ref-51)
52. William Leiss, C.B. Macpherson Dilemmas of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9 P68 [↑](#footnote-ref-52)
53. [加] C.B.麦克弗森：《自由民主的生平与时代》，闫飞飞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页 [↑](#footnote-ref-53)
54. 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1998年，第400页 [↑](#footnote-ref-54)
55. 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8页 [↑](#footnote-ref-55)
56. 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7页 [↑](#footnote-ref-56)
5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footnote-ref-57)
58. William Leiss, C.B. Macpherson Dilemmas of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9 P121 [↑](#footnote-ref-58)
59. 恶性循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低下与社会的不平等及占有性个人主义中人对自身的意识之间恶性循环，后者的问题带来前者的恶化，前者的恶化也加剧了后者的问题。 [↑](#footnote-ref-59)
60. [英]迈克尔·H. 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42页 [↑](#footnote-ref-60)
6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2页 [↑](#footnote-ref-61)
6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7页 [↑](#footnote-ref-62)
6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footnote-ref-63)
64. C.B. Macpherson,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40 [↑](#footnote-ref-64)
65.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8页 [↑](#footnote-ref-65)